

近代史研究

3

1983

JIN DAI SHI YAN JIU

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	刘大年(1)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何理(27)
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剖析·····	王钦民(54)
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	吴忠才(70)
国民党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	

和资源委员会的矿产管制·····	吴太昌(83)
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	汪敬虞(103)
容闳述论·····	袁鸿林(129)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李文海(158)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续篇)·····	张振鹂(175)
沙俄与在华国际银行团·····	刘蜀永(185)

问 题 讨 论	对一九二二年四月中共中央 西湖会议的质疑……………童志强 周 蕙(209)
	武汉国民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 性质的政权……………朱培民(221)
	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 一文写作情况的调查……………郑新如(237)

读史 札记	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	杨天石(240)
	《闽赣路千里》读后·····	陈铁健(243)
	关于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两个问题 的考析·····	杨里昂(249)
	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沿江川军兵力质疑·····	张家德(250)
	否认“华北防共协定”的证据不足·····	邵云端(253)

· 书讯 · 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中国近代史书籍

出版简讯·····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255)
一九八二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	
索引(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260)

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

刘大年

一、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

社会主义是人类创造的空前宏伟巍峨的大厦。它不只是应当建筑在最牢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也应当是建筑在最丰富、繁盛、高尚的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基础上的。历史包罗万象。它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可以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而又间接的。割断历史，鲁莽、狭隘地对待前代人的成就，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当然不等于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充数，一切都要摆在同等的地位。在多种多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根本任务，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最大限度地满足时代的需要。

历史研究是讲以往的事，如何与现实需要结合？前人早就知道，“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它与文学、经济学研究中结合现实需要所不同的地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把这个思想讲得更加明确。他们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家能够给这一代人什么东西，他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来满足那种希望在历史中发现解决当前任务的关键和指示的要求。只有和未来的

•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的学术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中的一部分。作者在大会发言后又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

变化有关的人，对于认识过去才真正发生兴趣。没有任何时代象现在这样，对历史家有如此众多的要求，渴望从历史上去领会和加以解释。这个时代要求历史家回答关于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如果历史家们规避这样的问题，关起门去欣赏自己陈腐不堪的那一套，他们就理应被看做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的问题的聋子^①。所有这些说法，出发点不一样，反映的社会条件和要求各异，但又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与现实无关，要有时代目的，反映时代要求，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负担的迥然有异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崭新时代使命。他们把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联系，完全不是看做外部的偶然的联系，而是看做内在客观规律的联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早、最杰出的代表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他明白表示，这部书是作为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写出来的。^②意思是说，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是由私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也“大抵相同”，不会例外。讲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昭示给人们的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往后，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邓初民、华岗等研究中国社会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陆续出版。归纳一下，非常明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时代使命：第一，揭露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动员人民参加革命斗争，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叙述中国是由原始共产主义而来，经过奴隶制、封建制，如今沦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它的前途，在于走

进社会主义社会。第一、第二两条是彼此衔接，不可分割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处在早期，理论上、资料上都存在不少缺陷。有的研究者试图把通史著作同某种短期斗争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也不可取。但是，民族解放和中国历史发展前途，是那个时代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所提出来的、迫切需要历史科学回答的首要问题。历史研究规避或者不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逃避时代要求，置民族和人民命运攸关的斗争于不顾。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当时所能做到的解答。他们的研究，很快在思想领域产生出强烈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成了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中国历史学的面貌从此焕然为之一新。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自然也有其局限性，但对时代提出的要求他们是交了卷的，是以他们的水平实践了时代使命的。

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严峻的考验，在中国牢固地站稳了脚跟。“鉴往知来”，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有什么“知来”的紧迫问题，需要从历史上去寻求答案呢？

和民主革命胜利以前相比，今天的环境条件当然是大不相同了。但是，现实生活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而且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需要，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第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规律性，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前，从来不为人所知。马克思主义观点一经和中国实际材料相结合，描述出一个大致轮廓，人们就受到吸引，鼓舞而起。半个世纪以来，新的资料不断出现，一些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原有的论述有的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里怎样表现，内容如何，至今还没有人从事系统的研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对过去的客观规律讲

不具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必然性的阐述就只能是原则的，不深入的。以前讲社会主义前途，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并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有何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实际上，社会主义主要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不可能消除由种种客观条件造成的“一切”不平等。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等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期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式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恩格斯说：“把社会主义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是正确的，但有片面性，容易引起混乱。^④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新事物，只能摸索前进。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实现四个现代化，还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奋斗。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新的矛盾，人们，尤其是青年里面不免产生许多新的思想问题，其中不少需要由历史学作新的研究来给予解答。回避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前途的阐述，就只能是重复旧的结论、旧的观点，而不会增加新的思想力量。人们就将抛开历史，从别的地方去寻求答案。第二，中国今天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必须看到它们要解决的任务是不一样的。革命的任务是集中破坏一个旧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创造一个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破坏旧世界的时候，历史的研究把主要力量放在揭露旧社会、旧制度，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

识。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愿，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自己的学说。^⑤又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⑥中国的文明史不止两千多年。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我们的先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他们的认识和经验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广义上来说，全部属于历史研究的工作。这自然是极其繁重的任务。全面认识中国的过去——物质的，精神的，经济的，文化的，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说到底，正是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据。第三，以前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主要从本国历史讲就可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世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地球的更大面积上瓦解了；又一方面，以前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者利用战争机会使自己更加膨胀，或者失败后依靠原先的潜力，卷土重来。它们汇合在一起，极力撑持着资本主义世界，以与社会主义制度激烈对抗。社会主义，对于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者，还只是一种羨鱼之情，远不是现实。新的科学技术兴起，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主义调整等，使资本主义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发昏狂叫：“共产主义是要完蛋的！”反过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将要长久存在下去。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完成的。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与资本主义并存，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正是在局部灭亡到最后灭亡的程途之中。历史研究，必须通过一个一个国家历史的具体研究，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说明它们将要走向的未来。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科学阐述，提高到一个

崭新的水平上来。

社会主义是与中国十亿人民命运攸关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伟大事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集中起来说，就是与广阔的社会主义现实相接触、相联系，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历史学的特定性质，把阐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研究放在中心位置上，解答这方面由新情况产生的新思想、新认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当前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在相当长时间里的根本使命。

问题提出来了，现在应当从什么地方入手，或者说，抓住哪些重点研究，来实现这个使命呢？一一叙述不可能，只能举些例子。

二、从历史上阐述社会主义前途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举例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历史，是首先应当继续加强研究的领域之一。

历史规律是人们经常讲的。但是什么是历史规律呢？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东西”。^⑦又说，重复性就是常规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结束。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一十年里，有三个前途，三种选择。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变为殖民地，这是帝国主义、外国侵略者指望的前途和选择。二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变中国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的前途和选择。三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的前途和选择。一百一十年激烈斗争的结果，帝国主义最后彻底失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也未能成功，中国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这个结论，而要深入研究导致

这个结论的全部客观规律是什么。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找出其中是哪些“同一”的、“巩固”的东西，找出是哪些重复律支配中国走进了社会主义社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人们讨论和议论这方面的问题，有一种“早熟”说。意思是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搞早了，是人为的。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时期的历史，阐述它的客观规律性，很需要分析一下这个论点。

历史本来是人创造的，或者说是人为的。问题在于从私有制到社会主义这样空前深刻的大变革，为什么那些阶级、那些人的斗争最后失败了，而这些阶级、这些人的斗争最后胜利了。生产力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是决定性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切疑难就会像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矛盾太复杂、太尖锐了。事实证明，单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不能说明中国是否会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矛盾和生产力水平的关系是怎样，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恽代英、蔡和森等人，就作过很好的回答。恽代英答复醒狮派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物质条件的指责说：“照我的解释，共产党人之信仰共产主义，以及广东党军之勇猛直前，一则是由于这些分子多半是破败下来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他们的动摇而痛苦的生活，使他们易于接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于是或委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或自甘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效死，这如何不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呢。”^⑧ 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说：中国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到了这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给自己的需要，帝国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更多的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无法生活。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流为盗贼，或饿

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二是把他们的生死问题提到中国社会和帝国主义面前，走社会革命的前途。“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死，但使群众一旦觉醒，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被压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知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⑩。他们的中心意思，都是说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迫使中国无产阶级、广大劳动群众要去信仰共产主义，走“社会革命”的道路。“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这里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高低。它“具足不具足”，不能阻止人民走社会革命的道路去救死求生。相反，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这是近代中国一切问题、一切斗争的根据。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就蕴藏在这个根据里头。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那些阶级、那些人违反它，就被历史无情淘汰了；这些阶级，这些人顺应它，就推动历史前进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或延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就象当初没有什么力量阻止西方进入资本主义一样。它们都是各自内在根据的产物，都是各自行所必然。历史的动向、行程和归宿，决定于整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在私有制社会，决定于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而存在的社会各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决定于革命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实践，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想象的“标准”。古往今来的历史从来也不是按照人们主观想像的“标准”行

进的。以为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就合乎逻辑了，不算人为的了，那不是历史的研究，而是一种历史假设。

中国近代史的讨论中，一些文章把洋务运动、立宪派都作为进步的运动、进步的势力来评论。尤其是关于洋务运动，不但学术讨论的文章里面，在介绍历史知识的文章里面，也都作为进步的运动来加以肯定。这方面的讨论实际涉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新评价，特别是涉及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新评价。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同样是从资本主义发生、生产力水平出发的，认为洋务派是这方面的先进者。洋务派的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实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当权派。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和买办阶级相联系，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所办的工业，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轻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也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相反地，是成了维持、加强那种压迫、剥削的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前进所迫切需要的，恰恰就是要摆脱那种压迫剥削，要有自己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而首先是要求民族独立，要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便力求同洋务派划清界线，把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崛起，除了与改良派论战，矛头也指向洋务派，也是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去反对的。洋务派如果确实是一个顺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那就必须承认，是历史奇特的恶作剧，几乎愚弄了所有的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受愚弄、看错人了，都把进步势力作为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帝国主义也受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的势力当做自己的同盟者加以支持，去镇压中国人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洋务派是怎样一种势力，通观中国近代史，就可以了然于怀。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必有的产物，是与这个制度相终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存在，洋务派这个阶级力量、政治集团就存在。它的第一代，是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

派；第二代，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第三代，是蒋介石、四大家族。它们的朝代、招牌改换了，依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集中近代工业、军权、政权于一身，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没有变化。有变化、也只是这些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在旧中国，工业生产水平最高的时期，是抗日战争以前蒋介石统治的时期。如果只从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立论，那又当如何评价蒋介石、四大家族的统治呢？洋务运动需要继续研究。现在不是要在这里讨论洋务派的评价问题，而是讲不能单从中国资本主义状况、生产力高低寻求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根据。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历史，离开反帝反封建，就告诉不了人们任何重要的东西。但今天我们研究的着眼点确实应当和三四十年以前不同了。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以前那些奴役者留下的极不光彩的某些“遗产”，虽然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想死抱住不放，例如英国抱住香港，美国抱住台湾，以至居然提出湖广铁路债票等等，历史的支配权毕竟不在他们手里了。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客观规律，说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这是历史的主题。当前的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自己的三十四年，这段历史应当提上日程，认真开始研究。

中国在这段时间里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重大曲折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它也没有不证明这个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人们追寻它的原因，自然首先想到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到此为止，就没有说明半点东西。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不是做对了，就是做错了。如果研究历史仅仅找出某人做了错事，可以说没有什么价值。恩格斯评论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

信，（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十一个人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道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⑩。同类的话，马克思也讲过。他们都是强调指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革命的胜利、失败，都不应该从几个领袖人物的动机、缺点、错误中去寻找，而要从社会总的状况、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那上面指出：社会主义的某些规律，我们还不认识；党是从长期战争、激烈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论点，被当做教条或者误解了；苏联的压力，迫使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切，汇集在一起，使得“左”的思想，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时成了不可阻止的趋势。其发展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个分析确切说明，“文化大革命”是那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的产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关系，无损于这个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论点被当做教条或误解了，在这里，主要又是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个别论点被当做教条或误解了。“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旗帜的。动乱中卷入的群众那样广泛，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少数野心分子，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至少在初期，是抱着维护社会主义的热情，卷到斗争里面去的。一旦林彪、江青一伙暴露出他们是阴谋篡党窃国，是在破坏社会主义，广大群众和干部就纷纷起来抵制，最后把他们打倒了。这证明，人心的向背，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否为转移的。十年动乱，全面内战；“四人帮”打倒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国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轨道。就在这个时间里，一大批老一辈的民主主义

者、老军人、著名科学家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多半年届高龄，处于负责的和享有很高荣誉的地位。为什么这时还要加入共产党呢？道理很明显：他们以自己的丰富阅历、长期体验，确信共产主义是人类伟大、正义的事业，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能够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爱国思想，追求真理的精神，决定他们要把自己献给这个伟大事业，并作为一生的归宿。这些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挫折，不但没有动摇社会主义，而是从反面考验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古人主张走路必由大道，不走小径。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这三十几年的历史，可以用最新的材料来阐明中国要前进，社会主义是必由的大道。

中国从古迄今的社会发展史，是一个急需全面展开研究的重要领域。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没有共同的规律，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国内外学术界正在讨论。一种是赞成五种生产方式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固有观点，是否定不了的；一种是反对五种生产方式说，认为那是斯大林的“发明”，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统一的五种生产方式。究竟哪个看法对，讨论清楚，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有一定的好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有两条看来是十分明确的。第一，人类历史的发展，大体是照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行进的，人类最先处在原始社会，然后进到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最后将进到共产主义社会。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说“部落所有制”是人类“第一种所有制”。1857—1858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导言》上指出：“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①1859年马克思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那篇著名的《序言》。也就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叙述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时，特别注释说：“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

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⑫如果说，这一些还不明确，那么，到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原始共产社会的详尽叙述和1888年给《共产党宣言》加的长注里，就把“原始共产社会的典型的内部结构弄明白了”^⑬，就彻底肯定下来，谁也无法驳难了。古代的、封建的都是马克思讲过的。恩格斯说，“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奴役形式”。^⑭原始共产主义、文明时代的三大剥削制度，加上未来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它是斯大林的发明，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二，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必须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行进，不能越雷池一步。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说：米海诺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也达不到这种目的的……。”^⑮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四易其稿。综合这封信一、二、三稿的基本意思，是五种生产方式中，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有可能跳跃越级前进。同时，原始社会在不同的部落、民族中，又必然带有不同的特色。“并不是所有

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①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条，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⑦}。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历史规律提供根据，来认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全过程提供根据，来认识这种必然。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看，缺乏完整性，即使可以说明它的规律，也缺少典型性。这里所说的典型，当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叙述的西欧国家那种典型。其实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更有道理。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状况极不一样。直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奴隶制、农奴制都还部分残留着，没有最后消失，纷然杂陈。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也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之长，发展程度之高，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显著位置。把这些集合在一起，完全足以自成一个典型，成为一个与西方并列的东方典型。因此，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是一个能够产生重大科学成果的领域。利用历史和所有亲缘科学的资料，按照马克思说的，对那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完全有可能产生出世界第一流科学著作，打开人们的眼界。

中国经济史很需要用更多的力量来研究。

旧的历史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知道建筑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阶级斗争，不知道它们与社会生产和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那个时候，经济活动主要是作为政治、文化的从属因素去叙述的。《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的“正史”上，凡关于土地占有、商业活动等记载，大都如此。恩格斯批评德国青年作

家说，他们把“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在各种事物上，而不去作进一步研究。“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马克思、恩格斯许多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可以认为都是讲要重视经济史研究。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处在幼年时代，而我们却必须加速踏进自己的壮年。加固和扩展中国历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认识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发展过程，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质，都有赖于经济史研究取得最好的成就。

中国文化史，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研究的又一个方面。

文化史研究是一个很老的题目，然而翻开中国和外国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马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文化史研究的对象、目的等等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与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相区别，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一切国家、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物质生活、经济结构、社会内部矛盾，也都有反映那种特定物质生活、经济结构、社会内部矛盾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研究、论述历史，缺少了观念形态这个部分，就好比 we 想认识某位人士，但仅仅窥见其躯干，却不知道他的头脑灵魂是什么样子。这当然不能说我们认识了那位人士。马克思说，不能从人们的意识去了解时代，是说不要根据人们对时代的看法判断历史，而不是说研究历史，不需要知道当时的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都是讲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反过来文化又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且这种作用有时表现得比政治更顽强，更带有持久性。据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与经济史、政治史等相区别的观念形态史，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和阐述观念形态反映经济、政治，反过来，又作用于前者的客观规律性；它是历史规律的一个侧面，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研究它，认识它，正是为了研究、认识历史规律的整体，认识庐山的真面和全貌。